

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李毓中

前言

西班牙人與臺灣的早期關係，基本上可以區分成兩個時期；前一個時期可以從一五六五年起至一六四二年結束，後一個時期則是從一六四三年起至一六八三年。在第一個時期，由於馬尼拉大帆船太平洋航線的開闢，臺灣成為馬尼拉返回阿卡普爾科(Acapulco)航線的必經之地，西班牙人進而逐漸瞭解到臺灣的重要性而企圖佔領之，並於一六二六年派遣艦隊在今日的基隆和平島設立其據點，而成為最早殖民北臺灣的歐洲人，也因此留下了最早有關北臺灣原住民風土民情的史料。在第二個時期，雖然西班牙人已遭荷蘭人逐出北臺灣，但是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仍然是小心翼翼地持續對其敵國荷蘭人所佔有的臺灣進行觀察，並在一六六二年當明鄭取代荷蘭人成為臺灣島的新主人之後，臺灣島上的明鄭政權面對滿清勢力的壓迫，逐漸與菲島上的西班牙人發展出一種亦友亦敵的曖昧關係，在軍事上明鄭則希望能取得馬尼拉做為他們躲避滿清追擊的另一據點，而菲島的西班牙人亦對此企圖有所聞，但在經濟上明鄭與西班牙人雙方又得互相依存，西班牙人需要明鄭銷往馬尼拉的中國商品，明鄭則仰賴西班牙人自美洲運抵馬尼拉的白銀以支付一切開銷，而這樣的關係一直維持到明鄭覆亡的前夕。(註一)

過去在史料分散取得不易及語文等因素的限制下，西班牙

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的研究成果，一直不若臺灣史其它領域成果般豐碩，卻仍然有許多學者利用間接或直接的史料對此關係進行研究，且有了一些很好的成果。但不可否認的是，相對於荷蘭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成果而言，正如身為西班牙人鮑曉鵬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所述：「談到早期殖民臺灣史時，人們總是想到荷蘭人而從未想到西班牙人……」而有所不平。(註二)

事實上，這幾年來在鮑曉鵬教授及其他相關研究者的努力下，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的相關研究已經獲得很大的進展，且已經到了需有人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有系統的收集整理以及做一進行回顧之必要，以便瞭解目前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成果相關課題的研究進度以及較不足之處，因此，筆者為此一文討論之，並以筆者對這些有關臺灣西班牙文史料些許的瞭解，嘗試說明此方面研究未來可能與可以獲致成果的研究方向，最後，同時也將對筆者所知西班牙文史料有關東臺灣早期歷史的部分進行討論。

研究成果的回顧

在對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成果進行回顧之前，需說明的是，由於西班牙人殖民臺灣的時期與荷蘭人有所重覆，雙方曾經共存於臺灣的南北端十六年之久，因此，想要將早期臺灣歷史發展上的西班牙人與荷蘭人歷史予以完全分

開來討論，似乎是一件無法達成的事。所以，即使是在對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進行研究之時，仍無可避免地要求助於目前已有的荷蘭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豐碩成果，才能使此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與完整。

同樣地，雖然至今尚未見到以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成果為主題進行回顧的文章，但事實上，在過去的一些相關研究回顧的文章中，也都曾經對西班牙統治臺灣時期歷史發展的研究有所討論，例如曹永和教授的〈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註三）、石萬壽教授的〈明鄭時期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註四）、鮑曉鵬教授（Jose Eugenio Borao）的〈有關臺灣的西班牙史料〉（註五）、翁佳音教授的〈臺灣近代初期史的研究與問題〉（註六）以及劉翠溶教授的〈我們要如何研究臺灣的歷史〉（註七）。因此，本文便在這些荷據時期相關研究成果回顧與討論的基礎上，對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成果進行討論。

為便於對這些成果進行討論，筆者將這些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的研究成果，予以區分為：一、史料的相關成果；二、論文研究成果等兩個項目來分別討論之。

一、史料的相關成果

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成果，不若荷據臺灣時期研究成果般豐碩的主因之一，西班牙文史料獲得不易的因素應佔有相當大的比例。而其之所以取得不易，實際上可能又與兩者殖民組織型態的差異有關。

荷蘭人在臺灣的殖民活動，一切皆由聯合東印度公司（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縮寫為VOC，一般稱之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所管理，而臺灣商會所呈送的報

告，皆由巴達維亞的總督呈交公司的董事會參考並存檔，因此相關報告的保存較為集中。（註八）相較於荷蘭人的檔案，西班牙人的檔案保存就顯得分散零亂許多，除了臺灣長官（Gobernador）將殖民地概況寫成報告寄交菲律賓總督（Gobernador General）經新西班牙（墨西哥）副王（Virrey），轉呈印度委員會（Consejo de Indias）及西班牙國王外，在臺灣進行傳教活動的傳教士，則將他們的所見所聞寫成報告送交給其所屬的教會組織，除非有必要，不然教會組織不會將這些傳教士的報告向母國呈報，因此，這些有關臺灣的文件最後便存放在不同的機構內，造成日後史學工作者搜求上的困難，同時也對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的發展造成極大的阻礙。

有關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西班牙文史料的搜集與整理工作，最早應始於日據時期在臺傳教的道明會阿瓦列司（Jose Maria Alvarez）神父。他在進行臺灣歷史研究的同時，也發掘整理出許多有關臺灣早期歷史的珍貴西班牙文史料及地圖，今日普遍流傳的一幅最早的北臺灣地圖，首次被發表即是刊印在他的名著 *Formosa, Geografica e Historiamente Considerada*（福爾摩莎，詳盡的地理與歷史）中。（註九）只是，如同鮑曉鵬教授所言的一般「因為是用西班牙文所寫，所以一直未受到足夠的重視」。（註十）此外，日本學者村上直次郎也曾經對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的史料進行翻譯與研究。以下則是目前有關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史料方面的研究成果：

1. 史料目錄的整理與介紹

有關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西班牙文史料目錄的整理

工作，最初是附屬在菲律賓史的史料整理工作中，例如 Pablo Pastells、Pedro Torres y Lanzas 等人所整理出版的塞維亞印度檔案館所藏有關菲律賓群島史料目錄 (Catalogo de los Documentos relativos a las islas Filipinas en el Archivo de Indias de Sevilla) (註十一)。在這份目錄中，除了對印度總檔案館所藏龐大菲律賓史料進行編號的整理工作外，還為這些的史料內容撰寫了摘要，因此，我們可以方便地在這數冊的目錄中，找到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有關的史料摘要。

之後，則有 Luis Sanchez Belda 教授在進行西班牙境內所藏有關亞洲歷史的檔案整理工作時，將印度總檔案館內有關臺灣的史料整理出一份目錄。(註十二)筆者則在他的研究基礎上，以及筆者自行在該檔案館中所整理出的另一目錄相比較後，再綜合出另一份較為完備的目錄，而有關鄭經與西班牙人交往的史料也是首次出現在該份目錄中。(註十三)但事實上，有關臺灣早期歷史的西班牙文史料目錄整理工作，目前鮑曉鵬教授與筆者都仍在持續地進行中。

相關史料介紹的部分，除了早期日本學者村上直次郎及其弟子所進行的一些史料翻譯工作外，後來則有衛思韓 (John Wills) 教授 (註十四)、潘英海教授、(註十五) 鮑曉鵬教授 (註十六) 及 Manuel Gonzalez Pola 神父 (註十七) 等，都曾經分別地對這些史料撰文加以介紹，其中又以鮑曉鵬教授的貢獻最大。在他的積極努力搜求下，這些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的史料方得以重見天日呈現在我們面前。另外，筆者曾在鮑教授及 Julian B. R. Rivera 教授、Maria Lourdes Diaz-Trechuelo 教授的指導下，對西班牙、葡萄牙、墨西哥

及菲律賓等國檔案館，所藏有關臺灣史料概況進行了調查工作，並試圖將這些西班牙史料無保留地介紹給國內學界知曉。(註十八)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筆者所進行的史料調查與介紹工作，相較於後面會提到的史料翻譯與研究工作而言，這些都只是很粗淺的成果，對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發展的助益仍相當有限。

2. 史料的重抄與翻譯工作

除了上述史料分散搜求不易的因素外，古西班牙文書寫體的解讀與翻譯問題，也是導致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較難獲得突破性成果的因素之一。這項研究工作一直進展遲緩，自阿瓦列司神父在其著作中，曾對一些古西班牙文書寫體史料進行抄寫成印刷體的解讀工作後，(註十九)相隔了近三十年之久，才在其他有關菲律賓史料重抄的研究著作中，找到一些有關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的史料。(註二十)另外，由 Fray Diego Aduarte 神父於一六四〇年出版的著作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o Rosar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Filipinas, Japon y China (聖·羅莎理歐省傳教士在菲律賓、日本及中國的歷史)，也在一九六〇年代獲得重印，該作者運用了當時諸多的第一史料寫成該書，因此此著作的史料價值堪與第一手史料相當，對於西班牙統治期間道明會在臺灣傳教情況的研究，有相當大的助益。

除了西班牙文書寫體抄寫成西班牙印刷體的史料抄寫工作外，還有一些將西班牙文史料譯成英文的研究成果，其中最著名的即是 E. H. Blair 與 J. A. Robertson 所編譯的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註二十一)在美西戰爭後

，購得菲律賓的美國人，基於瞭解其新殖民地的需求下，而將有關菲律賓歷史發展的西班牙等語言相關史料翻譯成英文，一些有關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的史料，也被一起被翻成英文收錄進來。目前，學界中對有關臺灣的西班牙史料最具貢獻的鮑曉鵬教授，其多年來所主持的西班牙文史料翻譯成英文的工作，在蔣經國基金會的支持下即將出版，相信這項研究成果必然將會對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的研究，帶來突破性的進展。

除此之外，早期在取得西班牙文獻困難及解讀不易的情況下，臺灣本土仍有一些學者將已譯成英文或日文的西班牙史料翻譯成中文發表供學界使用，如賴永祥先生將一些重要的史料如一六二六年西班牙首次佔領雞籠的報告及有關鄭成功意圖征討菲律賓而與菲律賓總督往來的文書等，利用其它語言的譯本將之翻譯成中文。（註二二）另外，直接將西班牙文史料解讀譯成中文的工作，近些年來亦有相當大的進展，如翁佳音教授（註二三）、林盛彬教授、（註二四）林娟卉（註二五）以及筆者（註二六）等，陸續地將一些較特殊的西班牙殖民臺灣時期史料譯成中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做為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西班牙主要敵人的荷蘭人與英國人，他們基於敵情探知的需要，也留有不少有關西班牙人在臺灣地區活動的史料，這些史料理所當然也是有助於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史料的驗證與研究。主要的成果有村上直次郎先生的《巴達維亞城日記》（註二七）、曹永和、包樂史多位教授整理完出版的《熱蘭遮城日記》，值得高興的是，該日記在江樹生的努力下，中文版第一冊已經出版。（註二八）而畢業於萊頓大學的程紹剛先生

其尚未出版的博士論文，也是深具史料價值的著作。（註二九）另外，還有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教授等人所編譯的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中，（註三〇）也有一些相關的史料，這些史料的翻譯成果，大大地嘉惠了我們這些無法閱讀荷文的史學工作者。至於英文史料的部份，早期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編印的《十七世紀臺灣英國貿易史料》（註三一），近來該史料在Anthony Farrington暨臺大歷史系幾位教授的努力，又重新整理以英文出版。（註三二）

二、論文研究成果

以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為主題的研究成果，雖然不若荷蘭時期的研究成果般豐碩，但是這些年來隨著臺灣史的受到重視，連帶地西班牙殖民臺灣史這一小塊較模糊的歷史範圍，也受到人們相當程度的關心。事實上，在新史料陸續地被發掘出後，許多史學工作者也開始撰寫與西班牙殖民臺灣時期史有關的論文。不僅是針對西班牙殖民時期的統治與傳教活動進行研究，個別學科如人類學、語言學等的研究者，也都嘗試藉由這些新發掘出來材料，來對北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語言等相關課題進行研究，同時也有了相當不錯的成果。

此外，在此需說明的是，一些以早期臺灣史為研究課題或以某項產業為研究主題的著作，例如以北臺灣原住民或砂金、硫磺等議題的專著等，也都對西班牙殖民臺灣時期某方面的歷史課題有所著墨。因此，筆者文中所討論的研究成果，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單篇論文外，一些著作其內容對西班牙

與臺灣早期關係史有所研究的專書，筆者也在文中一併納入討論。

1. 西班牙對臺灣的治理與傳教

有關西班牙佔領北臺灣期間其殖民統治與傳教活動歷史的研究成果，首先仍得自阿瓦列司的 *Formosa, Geografica e Historicamente Considerada* 一書討論起。該書運用了相當多珍貴的西班牙文史料，來對西班牙人在臺殖民統治與傳教活動的歷史進行研究，但是，他所關心的課題，似乎仍主要是以西班牙人——特別是道明會——在臺灣的傳教活動為重心。只是，不可否認的是，至今該書仍是研究西班牙殖民臺灣歷史時不可不讀的著作，同時也是第一部且唯一的一部，以臺灣史為主題的西班牙文研究著作，卻因為語言的關係，而少為臺灣學界所充分利用。（註三三）

曹永和教授以其世界史的視野與立足臺灣的關懷，也對此段時期的歷史有所討論，並發表了一些相關的論文。（註三四）特別是在其〈環中國海域交流史上的臺灣和日本〉等文章中，更以長時間的觀點對臺灣與東亞大陸外緣一系列群島之間彼此的關係與交流進行討論，且點出了臺灣在西歐各國在東亞殖民拓展政策中貿易與戰略的地位。（註三五）筆者則在他的觀點上，寫成〈北向與南進：西班牙東亞殖民拓展政策下的菲律賓和臺灣（一五六五—一六四二）〉一文，對西班牙在東亞的殖民拓展政策下臺灣與菲律賓群島關係進行瞭解。（註三六）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學者也進行了此方面的研究，如提出「廣泛的海洋史研究，不正就對臺灣史研究有用嗎？」（註三七）看法的陳國棟教授，在二十年前即利用《巴達維亞城

日記》日譯荷文史料，寫成〈西班牙及荷蘭時代的淡水〉一文，文中充分利用了當時所發掘出的所有相關史料，來對西班牙人在北臺灣淡水一地的殖民、傳教活動及產業發展等事項進行討論。（註三八）而發掘西班牙殖民臺灣時期史料極有成就的鮑曉鵬教授，也曾以西、荷兩殖民帝國在臺灣的競爭以及西班牙在臺灣的殖民與傳教概況等主題，發表了一些論文。（註三九）

在西班牙人北臺灣傳教活動的研究方面，目前最重要的一篇研究成果，是由幾年前方才去世的中村孝志先生所寫的一篇論文〈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臺灣的佈教〉，該文運用了一相當多的材料及阿瓦列司的著作，再加上他對荷蘭時期歷史的瞭解與史料的掌握，因此非常詳盡地對西班牙人在臺傳教的過程與轉變進行了討論，至今仍是研究天主教在臺傳教歷史時必讀的一篇論文。（註四〇）此外，在 Jose Maria Gonzalez 神父所寫五大冊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道明會在中國傳教史）的第一冊中，也對道明會在臺灣的傳教活動發展過程有詳盡的描述。（註四一）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論文也對西班牙時期天主教在臺灣的發展有所討論，筆者在此不再贅述。（註四二）

已故的中西關係史大師方豪先生，由其昔日門生為完成其未竟之志而整理出版的《臺灣早期史綱》一書，書中也對西班牙佔領臺灣北部時期的歷史及西班牙人與明鄭的關係有所討論，只可惜受限於當時史料不足的因素而無法進行更深入的討論。（註四三）事實上，除了上述的著作之外，還有一些以荷蘭與臺灣早期關係為主題的論述，也都對西班牙人佔領北臺灣時期的歷史有所討論，可以一併參考。

綜合而言，西班牙人在臺灣傳教活動這一方面的問題，似乎是較受到學界的青睞，因此獲得較多且具體的成果。而西班牙人在臺的殖民統治議題，則較不受到重視。事實上，如研究荷蘭時期臺灣史極有成果的翁佳音教授即提到：「有關西班牙人在臺灣的統治制度與運作情形，仍然是今後研究者必須面對與克服的問題」。(註四四)此外，根據筆者所找到的西班牙文史料來看，有關西班牙統治臺灣時期管理制度、財政狀況、菲律賓總督與馬尼拉主教之間的鬥爭等問題，皆可以透過史料的解讀與研究獲得解決，希望不久的將來便見到這些研究成果的發表。

2. 西班牙殖民期間臺灣貿易、礦業與交通的發展

西班牙殖民北臺灣的首要目的，就是為解決荷蘭人在臺灣海峽南端掠捕中國貿易船，而造成馬尼拉的西班牙人菲律賓群島內以及太平洋貿易物資匱乏的問題，因此他們希望另闢一港口來進行與中國的貿易。但是，由於已挖掘出的史料相當有限的關係，所以至今我們對此課題的瞭解仍相當有限。除在Pierre Chaunu的名著*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les Ibeiques XVI, XVII, XVIII*中，找到一些早期臺灣與菲律賓之間的貿易數量的統計資料外。(註四五)另外，吳奇娜的碩士論文《十七—十九世紀北臺灣硫磺貿易之政策轉變研究》，算是少有討論及西班牙人在臺灣經營對外貿易的一篇論文，文中針對西班牙佔領時期，北臺灣原住民的硫磺開採情況與西班牙人經營硫磺的政策有所討論。(註四六)

除了硫磺此項礦業外，西班牙人殖民臺灣時期另一項最重要的礦業發展，則是他們對金礦的熱衷及相關資訊的搜求

。這方面的論文，早期在中村孝志先生其一系列有關荷蘭時期探金事業的論文中，完整詳實地對西班牙人及荷蘭人在臺灣的探金活動進行論述。(註四七)唐羽先生的專著《臺灣探金七百年》中，除了充分的運用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外，唐先生涉獵了大量的地質學與礦業的知識，更使得史料與事實之間獲得了印證。(註四八)至於硫磺礦的開採經營，吳奇娜的論文中，也有詳盡的分析與討論。

提到貿易與礦業，自然會想到交通的發展，除了陳國棟教授文章中提及，西班牙人殖民臺灣時期所開闢的兩條淡水與雞籠之間的交通路線外，(註四九)唐羽先生在其《古代噶瑪蘭與前山間交通道路之研究》一文中，則對西班牙人開闢海路進入蘭陽平原的史實有所討論，文中並對宜蘭與北臺灣之間「生番所居，人跡罕到」陸路隔絕一說提出質疑，且如其所言的確有重行思考之必要。(註五〇)

大體而言，產業方面如砂金及硫磺等方面的研究，已獲得相當完備的研究成果，至少，就筆者所知的一些尚未發表的西班牙文史料來看亦是如此。而貿易與交通方面的討論，如西班牙人在臺貿易政策的內容、實際實施的概況以及對內對外的交通路線，甚至與荷蘭人的貿易政策比較等議題，則都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3. 西班牙統治時期的原住民

在當前平埔族相關研究受到重視的同時，最早殖民北臺灣的西班牙時期北臺灣原住民的歷史，也受到學界的重視與關愛，期待此方面的研究能有所突破，來些許彌補平埔族早期歷史文獻不足的問題，直到鮑曉鵬教授的文章發表後方才稍稍適時地解決了此一問題。(註五一)他運用了許多第一手

的史料對西班牙殖民時期各原住民部落的居住地、社會組織及宗教信仰等問題進行討論，該篇文章也成為研究臺灣「近代初期(Early Modern)」語言、人類及歷史等學者常引用的文章。

李壬癸教授在其論文中，以其一貫的嚴謹研究態度以及他既有的豐碩研究成果基礎上，參考了鮑教授文章中西班牙的史料，來對北臺灣各原住民語的差異性進行分析。透過對這些族群彼此之間語言及族群親疏關係的瞭解，來釐清他們過去數百年內分化及遷移的歷史，並在該文中對西班牙殖民時期西班牙語對噶瑪蘭(Cabaran)語及巴賽(Basay)語詞彙的影響有所討論，同時對鮑教授的看法提出一些修正。(註五二)

如果說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我們「由後往前」來對西班牙殖民時期原住民歷史進行瞭解的推驗依據，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則提供我們「由前至後」的背景瞭解，有助於我們尋獲這些西班牙史料記載中原住民社群居住的所在地。而劉益昌教授的研究成果正提供西班牙時期原住民社群所在地研究的依據，將劉教授所繪置的考古遺址分布圖來與西班牙史料中所提及的原住民部落放在一起討論，將有助於這些地名地理位置的釐清。(註五三)

詹素娟教授在其文章〈Sanasai傳說圈的族群歷史圖像〉中，(註五四)則對鮑曉鵬教授誤將哆囉滿(Turoban)誤置於基隆下方的問題做了辨正，並且將鮑教授一文與中村孝志先生的研究成果及《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相對照，而為Esquivel神父報告中的許多地名找到了今日可能的社名或地區，例如Patibur可能為今日花蓮壽豐鄉壽社的阿美族舊社，

Chiulien為水蓮尾阿美族舊社，其它如Saguiraya、Rarangus(註五五)、Tabaron等也都找到了可能的社名。她並指出「西班牙在臺時期，其影響力或族群接觸範圍，不僅止於雞籠、淡水的北部地區，與東臺灣的族群亦有相當程度的互動」。(註五六)另外，康培德教授也在其論文中對這些地名與東臺灣的關聯性，進行了一些考證，這些考證皆將非常有助於Esquivel神父報告中地名或部落名考證工作的進行。(註五七)Esquivel神父若地下有知，也會為他這份似乎臺灣遍布金銀，意圖讓菲律賓總督重視臺灣殖民地的報告，雖打動不了總督的心，但卻在數百年後得到後人的一些驗證與肯定而感到喜悅吧！

此外，詹素娟教授及劉益昌教授還編著了《大臺北都會區原住民歷史專輯》一書，該書完整地蒐集了現有所有有關大臺北地區原住民研究的研究成果，除了對這些成果進行分析討論外，並將這些零散的資料予以非常有系統的編輯整理列表，成為研究北臺灣原住民歷史時不可或缺的參考工具書，當然，研究西班牙殖民臺灣時期歷史的工作者亦是如此。(註五八)

有關西班牙時期所記載原住民居住地理位置的研究，首推翁佳音教授的著作《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註五九)該書運用了荷文、西班牙文、中文與日文的史料與著述，來對一幅一六五四年荷蘭古地圖進行考證與解讀的工作，並且也對西班牙人文獻中所提到的幾處原住民居住地如金包里(Quimauri)、沙里(Tapari)與噶瑪蘭等進行了考證的工作，如同劉益昌教授所言：「『大臺北古地圖』詳細的考證和解說，可說是佳音兄拋出一個巨大的石頭在北臺灣歷史研

究的池塘中，無疑將激起廣泛的迴響和浪潮」。(註六〇)雖然鮑曉鵬教授對其論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註六一)但是，筆者以為如此的良性對話與討論，未來將有助於我們對西班牙殖民臺灣時期各地理名詞方位的瞭解，且透過這些瞭解也將有助於其他學科如考古學、人類學或語言學的相關研究。除此之外，一向具有問題意識，希望對因襲的歷史「事實」或「敘述」提出修正與重構的翁佳音教授，在其另一篇論文，則對西班牙殖民時期北臺灣的商業活動以及原住民的商業性格等有所討論。(註六二)

大體而言，在目前史料仍相當有限的情况下，西班牙統治期間原住民社會的研究仍舊有了相當不錯的研究成果，但是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在「平埔族研究」、「宜蘭研究」或「東臺灣研究」等議題下完成的，因此想要建構西班牙統治期間原住民社會的歷史，似乎仍得需在一個較完整的架構下進行，而張隆志教授所提出的「六組研究課題(the 6 Ws)」正好提供了西班牙統治期間原住民歷史研究與思考方向的準則。(註六三)筆者將之應用在西班牙時期為：

- 一、西班牙統治期間原住民族群的界說與分類(What)：
- 二、西班牙統治期間原住民族群的人口與特徵(Who)：
- 三、西班牙統治期間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與文化分期(When)：
- 四、西班牙統治期間原住民族群的地理與聚落的分布(Where)：
- 五、西班牙統治期間原住民族群研究的方法與理論(How)：
- 六、西班牙統治期間原住民族群研究的意義與應用

(Why)：(註六四)

最後，根據筆者所知，應該還有一些珍貴的史料尚未發表，所以等到鮑曉鵬教授將這些新史料出版公諸同好後，相信將會更有助於此方面的研究，例如傳統的思考在提到西班牙傳教士被原住民殺害一事時，通常聯想為臺灣原住民的殘暴，但事實上這些衝突可能是來自於原住民對於西班牙傳教士守貞及對天主教教義質疑而產生的衝突，而非一時的妄動而已，若果真如此，對於西班牙傳教士被原住民殺害一事的歷史解釋，則可能需要從更多以文化衝突的層面來討論才行。由於筆者此方面應備的學識相當有限，尚在努力研讀相關著作中，因此上述的意見僅為筆者個人的淺見。

4. 明鄭時期與西班牙的關係

有關明鄭與西班牙關係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傳奇人物鄭成功的身上，有賴永祥先生撰文針對鄭成功在佔領臺灣之後，籌劃的征服馬尼拉行動進行討論，(註六五)衛思韓教授則討論另一具冒險家特色傳奇人物的道明會傳教士李科羅(Victorio Riccio)，與鄭成功及鄭經兩代的關係，(註六六)鮑曉鵬教授的文章所討論的課題大致與衛思韓教授相同。(註六七)筆者則在前人既有的研究成果上，並藉由一些有關鄭經的新史料，來對明鄭四代與西班牙人的政治、貿易與宗教關係進行討論，雖然有不盡完備深入之處，但仍可勉強參考之。(註六八)

相較於其他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的討論而言，明鄭與西班牙關係的研究成果是比較完整的。但仍有一些小的疑團尚未釐清，例如鄭成功是否曾對菲律賓出兵一事至今仍未成謎。因為，根據荷蘭人的說法是有此事的，(註六九)而西班牙

牙的一份間接史料也證明此事，甚至還指出了明鄭船隻的損失數量，（註七〇）但是中文史料則從未提及，因此是否真有其事，可能還得等待新史料的發現與解讀，如一份有關明鄭最重要的西班牙文獻，李科羅傳教士所寫有關鄭成功（Pompan，本藩）及中國概況的報告，筆者一直苦尋不得其蹤且索求無門，但近日終於從別的書籍中得知其藏身之處。（註七一）如能對該份史料進行解讀工作，相信明鄭與西班牙關係的研究成果將會更為完整。

結語

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的研究，開始於日據時期西班牙Alvarez神父、日本學者村上直次郎、中村孝志等教授的努力，而在曹永和教授及賴永祥先生等先進的接棒努力下，開始了另一個階段。但是，在曹教授將其重心放在荷蘭部份及賴永祥先生前往美國後，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的研究，便少被學界所接觸，一直到來臺任教的鮑曉鷗教授出現後，方有轉機，重新為此方面的研究開啟了一扇窗。當然，值得一提的是，雖忙於荷蘭史料堆中的曹永和教授，也給予了鮑教授不少的幫助與鼓勵。因此，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的重新開展及成長，曹永和及鮑曉鷗教授兩人的努力實功不可沒。

綜合而言，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的史料整理翻譯工作，近些年來已經有相當多的成果出現。但是，可能是這些史料在漫長歲月中，重抄過程中所造成版本的差異，導致了一些史料標題相同，內容卻有所差異的現象。（註七二）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可能是如何在這些現有的成果基礎上

，進行史料抄本譯本再校正的工作。畢竟，史料是歷史研究的最基本素材，有誤的史料極有可能會導致歷史解釋的重大偏差，所以未來如何將這些譯文加以統一校正的整理工作，可能是需要更多人力、物力與時間好好規劃投入的工作。另外，如翁佳音教授所提到的如何將史料「本土化」，這一點可能也是需一併注意的事。（註七三）

至於在研究成果方面，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的研究，過去在史料分散取得不易及語文等因素的限制下，成果一直不若臺灣史其它領域成果般豐碩，但這幾年來在鮑曉鷗、翁佳音等教授及其他相關研究者的努力下，利用直接或間接的史料對此關係進行研究，而有了一些很好的成果。可是，許多需微觀討論的問題，如西班牙統治臺灣時期的管理制度、財政與貿易情形等問題，卻都尚未得到釐清。此外，如同馬尼拉的情形一般，西班牙人在東亞的殖民活動在經濟上是十分仰賴漢人及日本移民的，西班牙統治期間北臺灣的「生理(Saltier)」人活動情形等，至今都仍未見到相關的研究成果出現。不過，這些方面的問題，卻非研究者單方面便可解決的問題，而是需要相關方面的史料早日搜集完備予以翻譯出版後，方能徹底解決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的困境。最後，在上述尚待研究的問題獲得解決後，一本單以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為單一研究主題的專著，可能也是我們需努力的方向。

另外，在如何將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成果，與其他相關研究成果相結合，也是一件非常需要重視的問題，例如與「平埔族研究」、「宜蘭研究」、「東臺灣研究」或「淡水史」（註七四）等個別主題的研究成果相結合、互相驗

證，以便做出更可能接近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的「暫時性」結論，可能是一件需要進行的工作。因為，目前在進行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的工作者如筆者，基本上對於西班牙殖民史稍有涉獵，但對臺灣原住民歷史的瞭解著實有限，因此如果單單以西班牙史料進行研究時，容易將這些西班牙文史料解讀錯誤，但若如果能與上述所提及的「平埔族研究」、「宜蘭研究」成果相結合，相信將可減少錯誤的發生。

(註七五)

最後，未來如何將西班牙與荷蘭兩個時空有所重疊，卻分開處理的兩個「時期」，放在一起來深入研究與討論，也是從事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的本土工作者需要思考的問題。目前已經將此兩個「時期」進行整合研究的翁佳音教授認為：「理想上最好不要再劃分為荷蘭時代、西班牙時代與明鄭時代……劃分時代後，各自獨立研究的結果，固然可讓研究更邁向專門化與深層化，卻很容易使研究者劃地自限……使臺灣近代初期的歷史肢離瓦解，歷史的連續性隱晦難見」，(註七六)一語道破了目前早期臺灣史研究的窘境。但是，也正如劉翠溶教授所言：「荷西時期臺灣史研究上的困難，應該不在於資料難得或毫無人才，而在於如何組成一個團隊，擬定計劃，分工合作來逐步進行」，(註七七)這可能也是一項現在就急需開始思考與計劃的課題。

*.. Julian B. R. Rivera教授、Maria Lourdes Diaz-Trechuelo教授、鮑曉鵬教授長期以來在西班牙文史料上的指導，陳國棟老師、詹素娟教授在許多觀念上的啟發，以及吳奇娜學友詳閱本文並提出諸多改進意見，僅在此一併致上誠摯的謝意。最後，筆者這些年留學西班牙如果有些許成果的話，這一切都得感謝我的老師曹永和先生，

謝謝他當年的鼓勵與多年的指導。

另，本文係筆者發表於宜蘭縣文化局宜蘭縣史館所舉辦「宜蘭研究」第四屆學術研討會之〈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的回顧：兼談有關早期東臺灣史的西班牙史料及其未來可能性〉一文中之部份章節，因考慮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回顧的闕如，承蒙宜蘭縣史館的寬允同意筆者將此部份交由《臺灣文獻》刊載，僅此向宜蘭縣史館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致上筆者的敬謝。

【註釋】

- 註一：筆者在此討論「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時，時間軸的年代界定及名稱是依照學界已有的共識而沿用之。見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思與言》第23卷1期(1985, 05)，頁3；該文收錄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333-358。
- 註二：Jose Eugenio Borao, "Fin de un capítulo histórico: La pérdida de la Fortaleza Española de Kelung a manos holandesas en el contexto de la rivalidad de los dos imperios coloniales", China Libre(1994, 01), p. 39。
- 註三：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收錄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333-358。
- 註四：石萬壽，〈明鄭時期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風物》第39卷4期(1989, 12)，頁71-105。
- 註五：鮑曉鵬著，李毓中譯，〈有關臺灣的西班牙史料〉，《臺灣風物》第45卷3期(1995, 09)，頁174-188。
- 註六：翁佳音，〈臺灣近代初期史的研究與問題〉，《臺灣文獻》第49卷1期(1998, 03)，頁79-89。
- 註七：劉翠溶，〈我們要如何研究臺灣的歷史〉，《臺灣文獻》第50卷2期(1999, 06)，頁1-13。
- 註八：曹永和，〈荷蘭時期臺灣史料介紹〉收錄於張炎憲、陳美蓉編

，《臺灣史與臺灣史料》（臺北：自立晚報，1993），頁1-21。現收錄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389-414。

註九：Jose Maria Alvarez, Formosa, Geografica e Historicamente Considerada, tomo II (Barcelona: Libreria Catolica Internacional, 1930)。

註十：鮑曉鷗著，李毓中譯，〈有關臺灣的西班牙史料〉，《臺灣風物》第45卷3期（1995, 09），頁180。

註十一：Pedro Torres Lanzas, Pablo Pastells (etc), Catalogo de los Documentos relativos a las islas Filipinas en el Archivo de Indias de Sevilla, 9 vols (Barcelona, Viuda de Tasso, 1925-1934)。

註十二：Luis Sanchez Belda, Guia de fuentes para la Historia de Asia en Espana (Munchen: K. G. Saur Verlag KG, 1987), pp. 61-65。

註十三：李毓中，〈西班牙印度總檔案館所藏臺灣史料目錄—附道明會在臺灣傳教史書目〉，《臺灣風物》第48卷1期（1998, 03），頁177-189。

註十四：衛思韓 (John Wills)，〈西班牙文獻中臺灣早期開拓史初探〉，《臺灣地區開闢史料學術論文集》（臺北：聯經，1996），頁197-205。該書雖出版於1996年，但實際上其論文發表於1985年。

註十五：潘英海，〈有關平埔族研究的西文資料〉，《臺灣風物》第37卷2期（1987, 06），頁39-53。

註十六：鮑曉鷗著，李毓中譯，〈有關臺灣的西班牙史料〉，《臺灣風物》第45卷3期（1995, 09），頁180。

註十七：見李毓中，〈西班牙印度總檔案館所藏臺灣史料目錄—附道明會在臺灣傳教史書目〉，《臺灣風物》第48卷1期（1998, 03），頁189-192。原文發表於〈Dominicos en Extremo Oriente. Bibliografia General sobre su actividad misionera〉

Extremo Oriente Iberico Investigaciones Historicas.. Metodologia y Estado de la Cuestion. Madrid. Agencia Espanola de Cooperacion Internacional. 1989. pp. 290-291。

註十八：李毓中，〈西班牙、葡萄牙兩國檔案館所藏有關臺灣史料的概況與展望〉，《臺灣史研究》第5卷2期（1998, 12），頁135-146。以及〈墨西哥及菲律賓所藏有關臺灣的西班牙文史料〉，《漢學研究通訊》，總77期（2001, 02），頁58-64。

註十九：Jose Maria Alvarez, Formosa, Geografica e Historicamente Considerada, tomo II (Barcelona: Libreria Catolica Internacional, 1930)，頁415-439。

註二十：Isacio Rodriguez,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Agustiniense del Sanissimo Nombre de Jesus de Filipinas (Valladolid: Editorial Estudio Agustiniense, 1965-1994), 22vols。

註二十一：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Cleveland: A. H. Clark, 1903-1909)。

註二十二：賴永祥譯，〈菲律賓爾瓦之雞籠佔領報告〉，《臺灣史研究初集》（臺北：自版，1970），頁147-152。有關鄭成功意圖征討菲律賓而與菲律賓總督來往的文書，則參考〈明鄭征菲企圖〉，《臺灣風物》第4卷1期（1954, 01），頁19-22。

註二十三：翁佳音譯，〈西班牙、荷蘭文獻選錄〉收錄於黃美英主編，〈凱達格蘭族書目彙編〉（臺北：北縣文化，1995），頁103-121。

註二十四：林盛彬，〈一六二六年西班牙進佔臺灣北部及其相關史料研究〉，《臺灣風物》第47卷3期（1997, 09），頁173-192。

註二十五：鮑曉鷗簡介，林娟卉譯，〈關於臺灣的首份西方文獻〉，《北縣文化》58（1998, 11），頁42-47。

註二十六：李毓中，〈塞維亞印度總檔案館中有關鄭經的西班牙文史料譯述〉，《臺灣風物》第49卷1期（1999, 03），頁137-145。〈西班牙殖民臺灣時期的史料：聖·薩爾瓦多城的財務報告〉，《臺

灣史料研究》第14期(1999, 11), 頁119-146。筆者這些年的工作成果, 充其量來說不過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特別是我的老師曹永和先生——來對鮑曉鵬教授的研究, 進行「中文化」或「本土化」的加工過程罷了。

註二七: 村上直次郎原譯, 中村孝志校注, 程大學中譯, 《巴達維亞城日記》三冊(臺中市: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0)。另日文版為村上直次郎譯, 中村孝志注, □□□□城日記(東京: 平凡社, 1987)。

註二八: Leonard Blussé, M. E. van Opstall & Tsao Yung-Ho(曹永和),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1: 1629-1641* (Leiden: Rijks Geschiedkundige Publicatie, 1986)。江樹生的譯本則見江樹生譯, 《熱蘭遮城日記》第一冊(臺南: 臺南市政府, 2000)。

註二九: 程紹剛譯註, 荷蘭人在福爾摩沙(臺北: 聯經出版, 2000)。

註三〇: Leonard Blussé, Natalie Everts & Evelien Frech,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 1. 1623-1635*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1999)。

註三一: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十七世紀臺灣英國貿易史料》, 臺灣研究叢刊第57種(臺北: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59)。

註三二: Chang Hsiu-Jung, Anthony Farrington, Huang Fu-San, Tsao Yung-Ho, Wu Mi-Tsa, *The English Factory in Taiwan, 1670-1685*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5)。

註三三: 如能將此書譯成中文, 必然是功德一件, 見翁佳音, 〈十七世紀的臺灣基督教史〉, 收錄於林治平主編, 《臺灣基督教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宇宙光出版社, 1998), 頁22, 24。

註三四: 請參考曹永和, 〈荷蘭與西班牙佔據時期的臺灣〉, 〈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 皆收錄於曹永和,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 聯經, 1981), 頁25-44及295-368。

註三五: 曹永和撰, 鍾淑敏等人譯, 〈環中國海域交流史上的臺灣和日本〉; 曹永和著, 陳宗仁、陳俐甫合譯, 〈十七世紀作為東亞轉運站的臺灣〉, 皆收錄於曹永和,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 聯經, 2000), 頁1-35及113-148。

註三六: 李毓中, 〈北向與南進: 西班牙東亞殖民拓展政策下的菲律賓和臺灣(1565-1642)〉, 原發表於2000年5月11日淡江大學舉辦的「2000年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 將收錄於近日將出版的《曹永和先生八十秩壽論文集》中。

註三七: 陳國棟, 〈廣汎的海洋史研究, 不正就對臺灣史研究有用嗎?〉, 發表於財團法人曹永和基金會所舉辦之「東亞海洋史與臺灣島史座談會」, 1999年11月20日。

註三八: 陳國棟, 〈西班牙及荷蘭時代的淡水(上)〉, 《臺灣人文》3期(1978, 04), 頁27-37; 〈西班牙及荷蘭時代的淡水(下)〉, 《臺灣人文》4期(1978, 07), 頁25-33。其他的相關文章則有廖漢臣, 〈西班牙據臺考〉, 《臺灣風物》第1卷1期(1952, 01), 頁41-46。盛子棟, 《臺北文獻》直38(1976, 12), 頁351-358。

註三九: Jose Eugenio Borao, *Spanish Presence in Taiwan, 1626-1642,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17期(1992, 12), 頁315-330*。Jose Eugenio Borao, "Fin de un capitulo historico: La perdida de la Fortaleza Espanola de Kelung a manos holandesas en el contexto de la rivalidad de los dos imperios coloniales", *China Libre*(1994, 01), p. 39-45. "The Catholic Dominican Missionaries in Taiwan(1626-1642)" 收錄於林治平主編, 《臺灣基督教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宇宙光出版社, 1998), 頁33-76。

註四〇: 中村孝志著, 賴永祥譯, 〈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臺灣的佈教〉, 《臺灣史研究初集》(臺北: 自版, 1970), 頁112-146。

註四一: 翁佳音, 〈西班牙道明會在北臺灣的宣教〉, 《臺灣教會公報》2381期(1997, 10, 19), 第10, 11版。Jose Maria Gonza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1632-1700), Tomo 1, (Madrid: Juan Bravo, 1964)。

註四二：Fernando Mateos, First Jesuits Arriving in Taiwan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ies"收錄於林治平主編，《臺灣基督教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98)，頁77-130。

註四三：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北：學生書局，1994)，頁205-206。方豪先生也為此感到惋惜並在其文章中表示「筆者曾在馬德里(Madrid)與亞米拉(Avila)兩處尋求，迄無所獲，若干圖書館與檔案館，且託詞謝絕」。但事實上，在他曾前往的塞維拉印地亞斯檔案館(即塞維亞印度總檔案館)即是西班牙境內藏有有關臺灣史料的大寶庫，只是因他「旅費的缺少，假期的短促，竟不能多作勾留」，而與這些史料擦肩而過，難怪他寫道「車聲轆轤中，思潮起伏不已，不覺悲從中來！」。見方豪，《流落於西葡的中國文獻》，《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學生書局，1967)，頁1765。

註四四：翁佳音，〈臺灣近代史的研究與問題〉，《臺灣文獻》第四十九卷第一期(1998，03)，頁89。

註四五：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los Ibeiques XVI, XVII, XVIII (Paris: S.E.V.P.E.N., 1960)。

註四六：吳奇娜，《17—19世紀北臺灣硫磺貿易之政策轉變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00)，頁29-38(未出版)。

註四七：中村孝志，〈十七世紀荷人勘查臺灣金礦紀實〉、〈荷蘭人的臺灣探金事業再論〉、〈荷蘭時代的探金事業補論——特別關於哆囉滿〉，以上皆收錄於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臺北：稻鄉，1997)，頁165-257。

註四八：唐羽著，《臺灣探金七百年》(臺北：臺北市錦綿助學基金會，1985)。

註四九：陳國棟，〈西班牙及荷蘭時代的淡水(下)〉，《臺灣人文》

4期(1978，?)，頁28。

註五〇：唐羽，〈古代噶瑪蘭與前山間交通道路之研究〉，收錄於《宜蘭文獻叢刊13·「宜蘭研究」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184-235。

註五一：Jose Eugenio Borao, "The Aorigines of Nor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17th-Century Spanish Sources", 《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7期(1993, 06)，頁98-120。

註五二：李壬癸，〈臺灣北部平埔族的種類及其互動關係〉收錄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21-40。

註五三：劉益昌，〈臺灣北部沿海地區史前時代晚期文化之探討〉收錄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1-20。〈再談臺灣北、東部地區的族群分布〉收錄於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1-28。

註五四：詹素娟，〈Sanasai傳說圈的族群歷史圖像〉收錄於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29-59。

註五五：筆者據菲律賓聖多瑪斯大學所藏的Esquivel神父報告，認為Alvarez在其書中可能誤將Rarangus抄為Barangus。見Jose Maria Alvarez, Formosa, Geografica e Historicamente Considerada, tomo II (Barcelona: Libreria Catolica Internacional, 1930)，頁425。

註五六：詹素娟，〈Sanasai傳說圈的族群歷史圖像〉收錄於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29-59。

註五七：康培德，〈南勢阿美聚落、人口初探——十七到十九世紀〉，《臺灣史研究》第4卷1期(1999, 04)，頁5-48。

註五八：詹素娟、劉益昌，〈大臺北都會區原住民歷史專輯〉(臺北：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99。

註五九：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

註六〇：劉益昌，〈《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讀後〉，《北縣文化》58期（1998, 11），頁19。

註六一：鮑曉鷗，李毓中譯，〈對《大臺北地圖考釋》一書之評論〉，《北縣文化》58期（1998, 11），頁38-41。

註六二：翁佳音，〈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商業交易與原住民〉收錄於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45-80。

註六三：張隆志，〈追尋失落的福爾摩沙部落——臺灣平埔族群史研究的反思〉收錄於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257-272。

註六四：張隆志，同上註，頁260。

註六五：賴永祥，〈明鄭征非企圖〉，《臺灣風物》第4卷1期（1954, 01），頁17-33。

註六六：John Elliot Wills，耿升摘譯，〈多明我會士李科羅與臺灣鄭氏政權〉，《中國史研究動態》（1982, 5），頁14-20。

註六七：Jose Eugenio Borao, "Consideraciones en torno a la imagen de Koxinga vertida por Victorio Ricci en Occidente," in Encuentros en Catay, No. 10 (1996), pp. 48-77。

註六八：李毓中，〈明鄭與西班牙帝國：鄭氏家族與菲律賓關係初探〉，《漢學研究》第16卷2期（1998, 12），頁29-59。

註六九：據荷蘭人1662年12月26日的記載：「另有人謠傳，國姓爺已……而且他在馬尼拉也經歷一場大難，痛失二十條帆船。這些帆船由他派出，滿載中國人並有三名使者隨同前往那裡通告攻占大員和福島勝利的消息，但西班牙人馬上識破其鬼計，而且發現幾名隱藏在當地中國人中間的幾名奸細，將其帆船扣留並予以摧毀，還將所有船上的中國人殺害，清除了一大批隱藏在

那裡的好細」。見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臺北：聯經出版，2000），頁561。

註七〇：A. G. I. (Archivo General de las Indias), 330, L. 6。

註七一：該份史料的發掘與解讀將對明鄭研究，特別是對鄭成功與鄭經兩代交替之間史實的瞭解有所幫助。請參考李毓中，〈西班牙、葡萄牙兩國所藏有關耶穌會在東亞活動的史料〉，《漢學研究通訊》，總75期（2000, 08），頁403。

註七二：例如同為1626年西班牙佔領雞籠時長官西爾瓦(Fernando de Silva)所寫的報告，賴永祥與林盛彬的內容即有不小的差異，見Alvarez刊印誤將Rarangus抄為Barangus，見Jose Maria Alvarez, Formosa, Geografica e Historicamente Considerada, tomo II (Barcelona: Libreria Catolica Internacional, 1930)，頁425。諸如此類的問題其實很多，因此，筆者認為西班牙文史料這份「公共財」的翻譯工作，可能需集合大家的智慧，方能將譯文的錯誤減至最低。

註七三：翁佳音，〈臺灣近代史的研究與問題〉，《臺灣文獻》第四十九卷第一期（1998, 03），頁82-84。

註七四：張建隆，〈淡水史研究初探〉，《漢學研究通訊》，總期74（2000, 05），頁178-187。

註七五：另外，以筆者這一段時間所接觸到的西班牙史料來看，這些殖民者與傳教士所寫的報告內容有時可能是別有目的，因此在使

用時可能得與其它時期如荷蘭、清代的史料相驗證，否則很多驚奇或驚喜的發現，可能只是來自於三百多年前某個傳教士的「無心」之謊而已。

註七六：翁佳音，〈臺灣近代史的研究與問題〉，《臺灣文獻》第四十九卷第一期（1998, 03），頁79。

註七七：劉翠溶，〈我們要如何研究臺灣的歷史〉，《臺灣文獻》第五十卷第二期（1999, 06），頁2。

作者簡介

李毓中

西班牙塞維亞大學美洲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 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